

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生态小说中的伦理观

于明清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37)

提 要: 20世纪70年代, 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成为俄罗斯生态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家们以不同方式将大自然纳入人类伦理道德的保护圈内: 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中将戕害自然等同于对女性的侵犯; 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里把杀鹿阐释为弑母的罪孽; 雷特海乌的《鲸群离去》把人与自然的争斗等同于手足相残。

关键词: 生态伦理; 鱼王; 长角鹿妈妈; 爱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先生在该组织的“1998年世界教育报告”中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 在某种程度上, 取决于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给这个世界。”自然与人的关系并不取决于多种一棵树, 少摘一朵花, 而是取决于人的观念。正是为了孕育这种观念, 生态文学从倡导环保走向构建生态伦理。20世纪70年代, 俄罗斯文学明显地开始了这一转型, 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有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6年)、艾特马托夫的《白轮船》(1970年)和雷特海乌的《鲸群离去》(1977年)等。

1 《鱼王》中善恶的分水岭——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

阿斯塔菲耶夫很早就在《鱼王》中提醒人们, 只出于人类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关心生态平衡还远远不够, 必须把人类的权利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推广到整个自然界。这部作品由十几个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 每个故事都紧扣一个共同的主题——自然与人。同名短篇“鱼王”是全书的核心和灵魂之所在, 体现出一种整体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鱼王”的情节非常简单: 伊格纳季伊奇在叶尼塞河里捕鱼时差点和大鱼同归于尽, 最后大鱼脱钩而去, 满怀忏悔的人也幸免于难。作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用同时缚在一条绳子上的人与鱼警示世人, 人不能脱离整个自然界独存, 还要建立起一种囊括一切生物的广义的伦理道德体系。我们在读这个短篇时会发现, 阿斯塔菲耶夫不断地用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来提示人们: 要跳出文中的具体事件来分析故事背后蕴涵的象征意义。作家总是引导读者从生态整体主义的层面来感悟人鱼斗争的寓意。他选取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偷渔者——伊格纳季伊奇作为主人公, 并经常用渔夫、捕鱼人、甚至直接用“人”来称呼他, 这暗示主人公是以人类整体, 而不是个人身份来参与这场搏斗的。不仅如此, 作家还赋予他高于一般渔夫的本领和超人的能力, 使他具有传奇色彩。他“仿佛长出了一个不知名的附加器官”, 能“打起顺风耳, 睁开千里眼”。迷信的恰尔顿人对其捕鱼方法百思不得其解, 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会念咒。大鱼也非同寻常, 是鱼中的“王者”。“它从头到尾都像史前蜥蜴”, “外型类似古生物”。¹

大鱼在伊格纳季伊奇心里唤起一个念头，难道这是会变形的精怪，是“鱼王”？大鱼长着两只蛇一样冷漠的眼睛，蛇在基督教的符号体系里是魔鬼的象征。传说和宗教使现实中的鱼得到某种神性，与“鱼王”合二为一。此外，作品也常常离开具体描写对象，强调个别与一般的联系，让大鱼的个体意义弱化，上升为鱼类、水族、动物界、乃至整个自然的象征，甚至是一种法则和力量的象征。

伊格纳季伊奇对大鱼的伤害代表人对自然的侵犯，而主人公受到的惩罚则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河流之王和整个自然之王一起陷入绝境。守候着他俩的是同一个使人痛苦的死神。”鱼和人命悬一线的图景使人感觉到：人只不过是大自然这根链条上的一个小环节，链条无论在哪个环节上发生断裂，整个生态系统都将濒临崩溃。珍爱大自然就是珍爱人类自己！这就是生态批评家反复强调的生态整体观。

在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一体观后，作者借助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代表罪恶的黄色引导读者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来看待人鱼相搏的含义。作家在一段文字中三次强调周围都是黄色的，营造出凄凉、惆怅和不祥之感。置身于充满禁忌色彩的氛围中，身心都趋于崩溃的伊格纳季伊奇开始反省自己究竟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一件他几乎一生都在回避的事情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对格拉哈的玷污。被推下水的格拉哈“像一条白肚皮的鲑鱼，在浅水里挣扎、扑打，冻得惨叫”。鱼王的身上也显示出女性的特征：它长着一身只有女人才有的细皮白肉，柔软的肚子贴近主人公，仿佛在试图保护身上孕育着的生命。共同的特征使两者的命运隐隐相连，并在作家的反复对比和提示中融为一体。伊格纳季伊奇在潜意识里已经将鱼王和格拉哈相混淆，分不清自己“在这河上干什么？等待饶恕？等谁饶恕？”他对女性个体格拉哈的愧疚转移到了所有女性身上，其中也包括特殊的女性——鱼王。后者是水族、乃至整个自然的代表。经过格拉哈——“女性”——鱼王——自然的多次传导，伊格纳季伊奇终于确认：“大自然也是个女性！”侵犯女性是一种罪孽，侵犯大自然同样是罪孽。这样，作家就把大自然纳入了人的道德体系之内。

阿斯塔菲耶夫对一切人物的评判都基于生态伦理观。小说里善的代表是大自然的热爱者，如忠厚的阿基姆，正直无私的捕鱼监督和“我”。恶的代表是大自然的破坏者，其中有偷猎者科曼多尔，渔民格罗霍塔沃，“高尚的”禽兽伊格纳季伊奇，现代超人戈加·盖尔采夫。“人对周围大自然的态度，就已经是人本身，他的品格，他的哲学，他的心灵，他对周围人的态度。”“无理性的人在摧毁大自然时，也在道德上摧毁自己。”（А. Костылева 1998: 248）伊格纳季伊奇在忏悔中认同了生态伦理，最终获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拯救。相反，科曼多尔走向了人性泯灭的道路，起先是漠视鱼的痛苦，最后发展到把杀人看得就像杀鱼那样简单。

针对科曼多尔的所作所为，作家就生命的价值做出了深刻的思索：一个人如果对其他生物残酷无情，那么他对人的关心肯定是有限的。一颗完美的心灵不可能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对他人的同情和关心；一部分是对其它生命的冷漠无情。“随着对其他生命痛苦的麻木不仁，人也失去了同享其他生命幸福的能力。”（Schweitzer 1990: 130）完美的德性不仅应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还应在关心和爱护其它生命的行动中体现出来。人与组成大地生命共同体的石头、土壤、河流、植物、动物是平等的，都需受到尊重。每一自然物都是有着内在价值的生命体。人作为宇宙进化系统中具有反思意识的精神主体，有强大的反思能力。禅语说，一花一世界，一树一乾坤。在阿斯塔菲耶夫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平白无故生长的，一切都值得尊重。既然众生平等，人就要“敬畏每个想生存下去的生命，如同敬畏他自己的生命一样。”（王诺 2003: 41）

2 《白轮船》中真鹿与神鹿的融合——自然是人类之母

20世纪70-80年代，俄罗斯小说最惹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了“神话流派”。这股神话化

的趋势与吉尔吉斯族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名字紧密相连。从《白轮船》开始，在《花狗崖》、《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作品中，他刻意引入了神话、传说的内容，并通过这些神话、传说构成其作品的表层结构，又透过它们与现实形成一种对应、同构或变奏关系，显示了艾特玛托夫对现代人的处境与人类的悲剧性命运的独特思考，同时也让他的创作具有了哲理化倾向。可以说，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感人至深的原因就在于能藉激活古老的神话发出千百人的声音，能把浸透着远古人类深沉情感的原型重新发掘出来。

《白轮船》一问世，就以内容和结构的新颖震动了评论界。小说讲述了一真一幻两个故事。真实故事的主人公是个被双亲抛弃了的小男孩，七岁了还没有名字，没有伙伴，只有一个善良软弱、忍辱负重的爷爷和两个故事。一个是他自己编的白轮船的故事，另一个是爷爷讲的长角鹿妈妈的童话。当孩子的姨父——护林所所长奥罗兹库尔捕杀了突然出现在林区的长角鹿，大摆鹿肉宴时，忍无可忍的孩子怀着化身人鱼，寻找白轮船的梦想投河自尽。虚幻的故事是长角鹿妈妈拯救吉尔吉斯族最后两个孩子的传说。吉尔吉斯族的祖先在叶尼塞河畔被残杀殆尽，只有两个小孩逃脱，在逃亡途中又落入敌人的魔爪。麻脸瘸婆婆受命杀死孩子，危难之际，长角鹿妈妈救下了小孩，历尽艰险将他们带到伊塞克湖畔安家，延续了吉尔吉斯族的生命。但后来作为其分支的布古族人大肆捕杀长角鹿妈妈的后代，哀伤的鹿妈妈带着小鹿们永远离开了。

《白轮船》是前苏联小说中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轰动的神话化作品。艾特玛托夫在小说中采用了神话嵌入方式，即直接将完整的神话传说或者相对独立的片段嵌入作品的情节当中。“长角鹿妈妈”的传说作为独立的一章出现在真鹿的故事里，现实和传说的深层联系不仅让小说在结构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也让真鹿和神鹿合二为一，将大自然纳入伦理道德的保护范围，使猎鹿的行为等同于弑母的罪孽。

神话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神话中的情节曾在现实中“复现”。现实中的鹿和其它动物不同，对人类没有任何戒心，最终在林区再次遭到猎杀。其次，小男孩是神话和现实相通的关键。艾特玛托夫把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作为贯穿全文的主人公是匠心独具的。小孩的阅历极其简单，认识也带有局限性、片面性和主观性，但正因为天真无邪，有颗纯洁无暇的童心，才更容易接受产生于人类文学童年时期的神话，体会到人类童年时期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事实上，小男孩一直将周围的一切当作平等的生物看待，第四章中插入的神话就是他讲给自己的新书包听的。作家有意淡化孩子的社会性，孩子生活的环境是个偏僻的护林所，只有两户人家。他找不到同龄人做朋友，于是花草树木，山林岩石都成了他的伙伴。他给石头伙伴取的名字带有明显的人类特征，比如“坏家伙”、“好人”、“机灵鬼”和“笨蛋”等。在小男孩眼里，人的善恶并不是单纯由人类自身决定的，每个物种都有评判的权利。他借库鲁别克之口指责奥罗兹库尔时说：“你是个又歹毒又下流的人。这里谁也不喜欢你。森林不喜欢你，每一棵树，甚至每一棵草都不喜欢你。你是法西斯！”种种特质都让小男孩有可能将真鹿与神鹿相混淆。通过他对长角鹿妈妈会回来的信念，他在梦中和鹿的交谈，他在危难时见到的长角鹿妈妈的身影，作者让神话渗入到现实生活中来。

此外，人物和情节的对应与同构也是让鹿与神鹿合二为一的关键。神话中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现实中真正与读者见面的也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无名的小男孩，另一个是古莉查玛抱着的女婴。这中间似乎有着某种对应关系。神话中的孩子们在水边获救，现实中的小男孩的生命在水中结束。让我们仿佛见到一个因果循环的轮回。神话中的孩子们在失去亲人后，追赶人类的足迹，却遭到迫害，被异类拯救。小男孩最后曾向爷爷求援，也没有获得回应。作家在小说中暗示，爷爷对长角鹿妈妈开的一枪导致外孙的死亡，奥罗兹库尔斩断鹿角的同时也斩断了自己后代的根。母鹿被杀死，长角鹿妈妈的身影也消失了。这为小男孩跳入水中的画面添加了一幅远景，即叶尼塞河畔的两个孩子随他一起坠落深渊。麻脸瘸婆婆在杀死吉尔吉斯的最后两个孩子之前，向“叶尼塞”（母亲河）祈祷：“把他们收下，把他们带走吧。”

趁他们年幼，趁他们心地纯洁，趁他们还有孩子的良心，还没有害人的心思、没有做害人的事情，让他们离开这罪恶的世界吧，免得他们遭受人间苦难，也免得他们去坑害别人。”²如今，长角鹿妈妈保留下的种子被母亲河收回，忘本的吉尔吉斯人倏忽间回到覆灭的原点。神话和现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面上，传说是嵌入到现实中的一个故事，深层上，现实未必不能解释为传说之树的一根枝丫。

小男孩和奥罗兹库尔代表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念：整体主义生态伦理和狭隘的利己主义。对鹿的不同态度是划分两类人物的准绳，也决定了人物的善恶。莫蒙爷爷是善的传承者，是小男孩不忍离去的原因，但在杀死鹿之后，他变得陌生了，目光变得“疏远、奇怪而粗野。”小男孩对周围人的善恶、事的好坏十分敏感，最终以死来拒绝他童心所不能屈从的东西。作家用最不可调和的形式来否定恶，从而把暴露现实阴暗面的主题提高、升华到善与恶的道德伦理高度，赋予小说以更深邃、更广阔的内涵和更强烈、更浓厚的悲剧诗意。小男孩“短暂的一生，就像闪电，亮了一下，就熄灭了。但闪电是能照亮天空的。而天空是永恒的。”作家最后代替小男孩说，“你好，白轮船，我来了！”这即是一句誓言，也是一声宣言。蹈水而去的小男孩并不孤单，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步入白轮船的梦想。

3 《鲸群离去》中纳乌与雷武的结合——人鲸共同创世纪

雷特海乌的现代传奇《鲸群离去》也是一部神话化的作品，他讲述了从人鲸共同创世纪，到世界回到创世之前混沌状态的一个轮回。与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建设、论证生态伦理的方法不同，雷特海乌描述了一个人类逐步放弃这一伦理的过程，并以此提出末世警告。作家将生态伦理阐释为一个由于年深日久被人类遗忘的真理，即贯穿《鲸群离去》始终的“伟大的爱”。它的内涵与生态伦理相一致，不排斥外貌不同的异类，向所有生物伸出自己的手。“伟大的爱”是人类的起源：鲸鱼雷武感受到“伟大的爱”而变成人，同纳乌结合，繁衍出鲸和人类。“伟大的爱”是人类生命的支撑：纳乌作为它的象征而获得永生，向后人传达这一真理。她的后人阿尔马吉尔金残害鲸鱼兄弟，爱的火种熄灭，纳乌也随之死去。“伟大的爱”是人类重生的希望：纳乌生前讲述了一个关于未来的传说，崇尚阿尔马吉尔金式强权的人类最终将灭亡，回到她在创世前的状态。既然人类曾因为爱而诞生，也会因爱的回归而复活。鲸，或者说是自然万物谅解人类的时候，就是世界复苏的时刻。

《鲸群离去》的故事基于楚克奇民族起源的传说，即楚克奇民族是人与鲸鱼的后代。鲸和人类有着共同的祖先，是人类在海浪中的兄弟。由于无知和贪婪，人类不顾老母亲的劝阻，背叛亲情和恩情杀死了鲸，鲸死后恢复了人形。雷特海乌在《雾之梦》和《希望岛》中多次涉及这一神话，他在《鲸群离去》中将冻土带的传说作为真实的历史加以叙述。这部现代传奇排斥一切神怪之说。纳乌否认上帝和众神的存在，将其视为人在恐惧中的臆造。她甚至也不赞成砾石滩上的居民把鲸鱼作为神灵崇拜，因为这会让兄弟间变得疏远。对她来讲，世界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雷武的变形、自己的永生只因为家中有爱。“在伟大的爱面前”，世间万物“都感到惊讶、崇敬，似乎全都屏住了呼吸。”³多年之后，当人们不再相信鲸鱼是人类的兄弟时，它们再度拯救人于危难中，证明了“伟大的爱”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阿尔马吉尔金的时代。

阿尔马吉尔金是个以毁灭一切为乐的人。砾石滩上的居民本来习惯于给其它生物留下存活的空间，他们把部分草根留在老鼠洞里，还给老鼠送干肉片。但孩提时代的阿尔马吉尔金就已经开始嘲笑这种和平共处的生存方式，他用锄头毁掉老鼠洞，从里面掏出所有贡品。他撒网捕鱼时，总是千方百计把最小的鱼苗也扔进锅里。长大成人后，他打猎也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尽管猎取的海象肉已经足够过冬，但他还是一股脑刺死所有海象，彻底毁掉海象基地。竭泽而渔的捕猎方式剥夺了海象繁衍的机会，一个富足的冬天之后，得来的是第二年的饥荒。阿尔马吉尔金不断将屠刀伸向其他种族，让砾石滩的居民以肥胖和

贪婪声名远播。终于天上的飞鸟走了，地上的鹿和熊走了，海里只剩下鲸鱼一族。

阿尔马吉尔金热衷于打猎不仅是为了获取食物，更多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大。他以折磨猎物为乐，把捕获的海豹折磨得筋疲力尽。活剥让自己充满挫败感的髯海豹的皮，再将它扔回海里。他杀死鲸鱼，一方面是不想放弃唾手可得的动物，另一方面，他是想借此对抗纳乌。纳乌的永生是他无法超越的，于是他就想借旺盛的青春与其对抗。纳乌所爱的正是他所憎恨的，对“伟大的爱”和永生的憎恨其实从他的祖父吉乌那里已经萌生了，吉乌甚至想用刀子刺纳乌，看看能否结束她的永生。但吉乌的憎恨始终隐匿在心灵深处，而借着祖父威名，从小就不缺乏尊重的阿尔马吉尔金个性张扬。吉乌内心的想法在他身上成为外化的表现，因此他要做所有纳乌反对的事情。每当他损伤到纳乌所信奉的真理，后者就衰老一些。即使阿尔马吉尔金不知道纳乌衰老的原因，但后者的憔悴总是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强大。他在每次胜利后都要邀请纳乌当座上宾，并非出于尊重，而是在示威。阿尔马吉尔金时代的人崇尚强权，“感觉到自己是真正生活的主人。”人们在他的带领下，将屠刀伸向鲸鱼，终于以失去“伟大的爱”的代价印证了它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以上几个作品和生态女性主义有着共同之处，即践踏自然总是和侵犯女性相关的。阿斯塔菲耶夫的伦理构建就由侵犯女性而来。他在《悲伤的侦探》里将格拉尼娅大婶被蹂躏和大自然被玷污相提并论。奥罗兹库尔遇到任何不如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殴打妻子。这两部小说中，代表大自然的鱼王和鹿母也都是雌性。阿尔马吉尔金对自然的践踏也是和女性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英勇豪迈是在于敢于占领今天的幸福，就像抓住女人飘逸的头发一样。”他眼中的幸福就是充足的食物，肆意的捕杀。他在毁灭海象基地后，对自己的奖赏就是再娶个妻子。

雨果曾断言，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现代作家继续追逐着浪漫主义大师的梦想。生态伦理如今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也是当今生态文学阐释的核心。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伦理学的进步也可看作是平等程度的增加和应用范畴的扩大。从封建专制到民主制度，从男人享有专权到妇女解放运动，每一次平等范围的扩大都代表人类的进步。上述几位作家要求把这个权利扩展到人类范围以外。这种平等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自然界中的物种不可能绝对平等，因为生物界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等级次序的结构。作家所指的是人类除了为保障自己在生物链中的生存权利之外，不应该为了别的理由而剥夺其他物种生存的权利。生态伦理的建立理应被看作是人类伦理学中一个巨大的进步。由于建立了整体生态的伦理观，人类善恶报应的观点才能被应用到人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中。大自然惩恶扬善不拘泥于一定的形式，伊格纳季伊奇所受的折磨，科曼多尔失去女儿，盖尔采夫的死，奥罗兹库尔家的绝嗣，鲸群的离去都是大自然在善恶之间制造的平衡。正如老子所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附注

1 本文中《鱼王》引文都出自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夏仲翼 肖章 石枕川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2 本文中《白轮船》引文皆出自艾特马托夫：《白轮船》（力冈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3 本文中《鲸群离去》引文皆出自雷特海乌：《鲸群离去》（陆永昌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

参考文献

- [1]Костылева Л. А. 1998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XX веков[M]. М.
[2]Schweitzer 1990 Out of My Life and Thought(Translated by Lemke A.)[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Publishers.
[3]王 诺 2003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The Ecological Ethics Embodied in Some Russian Novels in the 1970's

YU Ming-q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eking 100374,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70's, the overall ecological ethics became the indispensable part of Russian eco-literature. Many writers brought the nature into the protecting extents of human ethics in different ways. For example, Astafyev regarded plundering natural as violations of women in his "The King-fish", Aitmatov elucidated slaughtering deer to such a kind of sin as mother killer in his "The White Ship", and Rytkeu thought the struggle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as the fratricide in his "When the Whales Leave".

Key words: ecological ethics; king fish; deer-mother; the love

收稿日期: 2007-06-14

作者简介: 于明清 (1976—), 黑龙江省牡丹江人,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锐]